

●王玉良

略谈我国古代文字的载体及书籍的起源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而且对东方各国乃至全人类的文明进程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文字书写材料和书籍制作方面,我们的祖先曾有过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并因此而享誉世界。

但是在使用纸之前,我国尚有一二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其时的文字载体和书籍形制又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众说纷纭,存在很大的分歧;甚至有些基本概念含混不清的说法,还广为流传。譬如有些书史著作,至今仍把我国古代文字书写材料纵向排序为:首先是甲骨,随后是青铜器,再后是石头,最后才是竹木和缣/帛。近年还有的著作提出什么龟册书籍、玉册书籍、简册书籍、方册书籍、缣帛书籍、金石书籍等等名称和排法。这类观点现在仍占据着专业教材和普及读物的领域。

近年已有一些学者,在有关的论著中对以上的错误说法,多次提出过批评,如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在所著《古文字学初阶》一书中,对此曾郑重指出:“我们上文已谈到甲骨文、金文等等,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些都是古代的书,商代的人用龟甲牛骨作为书写材料,周代的人

用青铜器作为书写材料。这种观点现在相当流行,进入了普及读物的领域。我刚刚看到的一本新杂志,便有在甲骨文时代人们用刀刻写文章一类的话。必须说明,无论甲骨文还是金文,都不能叫作‘书’,因为甲骨文只是占卜的记录,金文只是青铜器的铭文,它们都是附属于有固定用途的器物的。就像不能把后世的石刻称为‘书’一样,甲骨文、金文也不属于书的范畴。”^[1]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们的批评,至今尚未引起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和有关书史研究者的重视。

我们的邻国日本,近几十年来不断发掘出土大量古木简,一些学者因此倡议成立了木简学会,出版专刊,进行古代书史的研究。70年代以来,在英国文得兰达地区、意大利南部以及瑞士等国,也都曾发掘出土一些古罗马帝国时代的简牍实物,开始引起欧洲历史学者的研究兴趣。^[2]这些情况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相应地加强我国古代书史的研究工作,以便在关于世界古代文明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中,作出我们的贡献。

根据以上情况,我觉得首先应对我国古代文字载体和书籍的起源问题,开展充分的讨论,

重要环节。

第七,文献资源开发仅仅停留在手工阶段必然无法充分地得以进行,也无法缩短“加工时差”和“传递时差”。为促进文献资源开发的充分性、即时性与有效性,必须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运用电子计算机、缩微机、复印机等现代化手段。在现代化手段尚未装备起来前,也不能放弃

手工方式。

冯锦生 笔名金帛、申晋文等。现为山西大学图书馆情报学系副教授、《晋图学刊》主编。在20种刊物上发文52篇。通讯地址:山西太原市,邮编030006。

(来稿时间:1992-09-17。编发者:刘喜申。)

以期从学术观点上澄清某些模糊观念,提高我国古代书史的研究水平。下面我仅就自己的学习所得,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希望得到专家的批评指正。

一、我国古文字的产生 和书写载体的演变

我们知道,甲骨文并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作为世界文明古国,我国的文字产生和使用应该是很早的。但是在古文献记载中,有许多造字的神话传说,用今天的科学观点去分析是靠不住的。1899年殷墟甲骨文字的发现和被认识,成为我国古文字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距今3500年前的甲骨文,专家们认为它的文字结构不仅已由单体发展为合体,而且已经跨过初期的象形文字阶段,出现大量的形声字,成为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了;并一致认为在它以前很久,就应该有雏形文字的产生。解放后,由于考古的新发现,对我国文字起源的历史又有了新的认识。1954年发掘的西安半坡等地仰韶文化遗址,在出土的100多个彩陶标本上发现有50多个刻划符号。1959年在山东莒县和诸城出土的属于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又发现了许多个象形文字。它们比甲骨文字约早一千到两千年。这是我国文字出现的重要标志。我国文字的产生,与世界上最古老的巴比伦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出现的时间大体上相当。

文字的产生和应用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文字的使用也是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起于夏代,时间约为公元前21世纪到前16世纪。古代的一些典籍,如《尚书》、《左传》、《墨子》、《竹书纪年》等,都有夏王朝的简略记载。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里,按编年大事记的方法,把夏王世系一一列了出来。著名学者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根据甲骨卜辞考订殷王世系名号的专著,证明《史记·殷本

纪》所载商汤以前的“先公”大体可信,汤以下至凡三十王,更信而有征。商汤和殷先公们正是生活在夏王朝统治时代的人,那么就应该相信,《夏本纪》所载十七王的历史也一定是有根据的。史载夏王朝曾先后征服了许多部落、方国,不但要他们承认其“共主”地位,还要他们定期纳贡。夏贵族统治者役使大量奴隶,设置大小官吏掌管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并制定刑法、建立军队,来镇压奴隶和各部落的反抗。夏王又设史官负责起草和发布命令,掌管历法、图籍等文书档案。《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夏末国将亡,“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根据以上记载,历史学家们认为建立奴隶制国家的夏王朝已有初期的历法、文字体系和史官制度。有了文字、历法和史官,当然也就有文书档册一类专用的文字载体了。

商代是奴隶制社会继续发展的时代,农业手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了,说明当时文字的使用已相当广泛。那么商代普遍使用的文字载体究竟是怎样的呢?难道真是如一些书中所说的是龟甲兽骨吗?这是一个首先应搞清楚的问题。

《尚书·多士》篇记载周武王命令将殷贵族们迁于雒邑,周公告诫这些亡国的殷人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意思是说:你们知道,你们的祖先曾在许多大小典册上,记载你们殷人推翻夏朝政权的历史和文告。关于“册”和“典”的解释,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云:“册,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即册是竹木简札用两道绳子编连在一起的形象;又:“典,从册在几上。”即将册供奉在几上之形。汉代以后的学者一般均主此说,认为这是一条明确记载商代有竹木简册的文献资料。从后世发掘出土的甲骨文、金文考察,其“册”字正是简册的象形字,象两条带子编连一排竹木简札,“典”字象双手捧册或置册于几上的样子。甲骨文中还有“工典”、“作册”、“再册”,以及“史”、“笔”等字。从这些商代遗存文字的研究中,也可以证明

《尚书·多士》篇说殷人“有册有典”的记载是可信的。对以上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商代书写文字的载体应该是竹木简册。

下面我们进一步研究在商代之前,文字开始使用时的载体是什么样的。这在古代文献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一些与竹木有关的线索。

《易·系辞下》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话。什么是“书契”呢?汉郑玄《周易注》说:“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清孙诒让《契文举例叙》说:“文字之兴,原始于书契。契之正字为契,许君训为刻,盖锲刻竹木以著法数,斯为之契”。看来两家的解释是一致的,“书契”就是在文字出现以后,在原有刻契的上面再写上文字,以表述事物。在原始社会刻木记事的方法是相当流行的,后来发展为合木刻契,各持其一,以作为凭证。文字出现以后,才把要记载的事情用文字写在契上,成为“书契”。这种书契,逐渐取代了原始的结绳和刻木,统治者用于治理国家,收到了治百官、察万民的功效。《隋书经籍志序》也说:“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生焉。”从书契的使用,史官的设立,发展为书籍的产生。这些文献记载都是我们认识古初文字载体和书籍起源的宝贵资料。

“书契”一词作为最早的文字载体,在古书中经常使用。如《周礼·天官·司会》:“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副本)”。《周礼·天官·小宰》又有:“六日,听取予以书契”。孙诒让《周礼正义》对此进一步解释说:“凡以文书为要约,或书于符券,或载于簿书,并谓之书契”。据此,则书契可以泛指官府一切符券簿书了。而《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明成祖朱棣纂修《永乐大典》的圣谕:“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等等一些提法,则书契几乎和“上古书籍”的用法相同,可以泛指上古一切图书资料了。以上是文献记载的一些材料。

关于我国古代使用竹木作为书写材料的沿革轨迹,除解放前后我们曾在西北及全国各地

大量考古发掘了战国到汉时期的竹木简牍实物,为研究工作提供了直接的物证外,从我国古代一些发展缓慢,尚处于较原始的社会状态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出土的文字载体,也可以得到一些早期简牍形制的旁证。如新疆朱兰吐蕃古城堡曾出土若干吐蕃简牍(相当唐代,为古藏文),其中用于驿道的公文木牍上有一个槽,可以用绳捆扎后,加盖封泥。其他木简右端各有一个洞,可以用绳子串连在一起,据说实物是用皮条,即“韦编”。并且有的简牍有刮削的痕迹,似乎一次次加以利用。^[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满文本牌,是满族入关之前,官府用老满文在木牌上书写的公文。这种木牌是随时削木做成的,规格形制各异,一端有孔,两面或四面记事后,用绳串起来,称为“档子”。这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使用的简牍遗物,对我们了解古初文字载体材料和制作方法也是很有启发的。

书写文字的材料,必以方便易得为前提。上古时代只有少数官吏掌管文书档册,他们随时需要记载帝王言行和各种行政公务,必以用笔随手书写在竹木简牍上为便。随着文字的繁孳和记事范围的扩大,由使用单根的简札,发展到使用较为宽大的方版,不但能写较长的文章,还可以用作谱牒或绘图之类。以后记载的事情更复杂,由于文书资料的积累而编纂成系统的著作,于是最早的著于简册的书籍产生了。

在使用缣帛和纸以前,我国上古时代广泛使用竹木为书写材料,因其用途不同,形制不同,名称也不一样。主要有:简、策(册)、籍、簿、符、笏,以及札、牒、牍、版、方、榜、觚(又写作栝)等称谓,都属于竹木范畴,书史上统称为“简牍制度”。

二、甲骨、青铜器不是书写材料, 也不能称之为“书”

殷墟甲骨文字自从1899年被学者认识后,又经过多次科学考古发掘,在学术界引起很大轰动。据胡厚宣先生的统计,近百年来国内外研

究甲骨文的学者有 400 多人,发表有关论著达 2000 种,成为国际上的一门显学^[4]。对这些论著,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有些学者早期文章的一些观点,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已有改变,我们应该掌握这些情况。注意不要在今天,仍然引用人家已经声明摈弃了的那些观点。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早期写过一篇《商代龟卜之推测》,他曾说:“册字最初所象之形,非简非札,实为龟版”,“龟版之一长一短,参差不齐,又有孔以贯韦编,甚似‘册’字之形状”等等^[5]。董氏之说的依据,是曾发现一块龟甲上有“册八”,二字,认为是“册六”;又发现此甲上端断处似孔,仅余其半。这些看法后来都已被证明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册八”,经各专家考证乃是“册入”;甲上有孔以贯韦编之说本不确切,在大量完整的龟甲上,均未发现有贯串绳索之孔。董先生 1947 年在《殷墟文字甲编自序》中写道:“十年前我曾误解了‘册六’,以为甲骨就是殷代的简册,这毛病是过于‘尊题’。”又说:“殷代文字的应用,大部分应该是在典册上,所惜的是典册早已不存在了。可是在甲骨文字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典册的样子。例如‘王若曰云云’,是当时符命文告的习用语,原是写在简册上的文章。”又:“有一种礼节叫‘工典’,意思是献上先祖先妣的潜牒……在武丁时也曾见‘沚戡再册’的记载,这是殷代有典有册的证明”。^[6]后来的甚至直到今天的那种所谓商代的书写材料是甲骨,以及龟甲用绳编连而成为“龟册书籍”的说法,多源于董先生前面那篇文章,我们读了这后一篇文章,当然他们的依据就不存在了。

为了进一步辨明“甲骨是商代的书写材料和书”这一广为流传、积重难返的错误观点,下面从甲骨的材料来源,制作方法和形制上再作些具体的论述。

我国上古用龟甲占卜,在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在《尚书》里,如《夏书·禹贡》:“九江纳锡大龟”,是说大龟是从九江征来的贡品。《商书·西伯勘桀》:“格人元龟,罔敢之吉”,是说把大龟给了人,自己便不能知道凶吉。《周书·大诰》:“宁(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是说先祖文王

传给我们大龟,以问卜天命。这些说明,龟是非常宝贵神圣之物,龟甲决不是用于日常记事的书写材料。因为龟甲难得,所以一般的占卜才用牛羊的胛骨代替。甲骨在占卜前都需要经过特殊修治,作成一定形状,然后还要在其背面钻或挖出一个个圆形的“钻”和梭形的“凿”。有的在甲骨的顶端或边缘处刻上甲骨的来源、数量,以及修治和保管人的名字,叫做“署辞”。卜前,刻上占卜的时日、地点及卜者的名字,叫“前辞”。问卜的事情叫“贞辞”。卜时,用火烧灼“钻”窝,使其反面出现裂纹,称“兆”,将兆出现的情况和兆序刻在兆旁,叫“兆辞”,记录得兆后对照占书作出吉凶的判断,叫“占辞”。以后再刻上结果是否应验,叫“验辞”。这是最完整的卜辞格式。大多数的卜辞是比较简化的,还有的卜辞是从正反两方面问卜的。甲骨质地坚硬,刻上许多纤细的小字是很困难的,必须使用锋利的刀具。负责刻字的卜官必须经过专门的训练,较之用毛笔书写要繁难得多,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综上所述,可知甲骨是专用的占卜工具,材料具有神灵性且很难得,形式和制作也很特殊,用刀刻字,决不能称之为书写材料或书籍。

古代用铜锡合金铸造的青铜器,根据不同用途,分为许多种类,各有器名。大型的钟、鼎,是奴隶主统治者最珍视的“重器”,多用于国家大典和祭祀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可以象征社稷的存亡。由于青铜器在当时极受重视,又能保存长久,从商代中期以后,开始在器上铸刻纪念性铭文或徽号,以传后世子孙。周代的青铜器上出现了歌功颂德的长篇铭文,文字最多的毛公鼎有 497 字。

铸造青铜器,从采矿、冶炼、制作陶模陶范,到浇铸完成,工艺流程相当复杂,需要大批冶金工匠付出极为艰苦的劳动。铸刻那些较长的铭文,必须先在简牍上写好底稿字样,再由工匠们经过翻模铸在或用刀刻在青铜器上。所以说青铜器也不是什么书写材料。又因为青铜器是生活用具,呈各种各样的形状,各有专门用途,并且绝大多数是不带铭文的,所以更不能称之为“书”。

古代石刻文字历来与铜器铭文并称为“金石文字”，到宋代出现了专门以研究铜器和石刻为主的金石学。石刻文字现存最早、最著名的是《石鼓文》，其实它是春秋初期刻在10个鼓形石头上的10首四言诗。郭沫若认为是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刻石。后世秦皇汉武，直至清代的乾隆皇帝都喜欢刻石记功。现在全国各地还遗存不少东汉以来的摩崖、石碑、石碣等实物。摩崖是将山崖或洞壁铲平，将文字镌刻在上面。石碑是长方形的，石碣是圆顶形的，它们形体高大，气势雄伟。矗立于园林建筑或山野之间，加之名人书法艺术，歌功颂德文字自有其特殊的风景装点作用和历史纪念意义。

当然，历史上从东汉灵帝到清代乾隆，曾有过7次将儒家经典刻石公布，以及僧徒将佛经刻成石版隐埋岩壑或地下保存的史实。但这与“继青铜器之后人们又以石头为书写材料”毫无关系。东汉时中国人早已有了造纸技术的发明，而刻石之风近现代依然流行。

我国古代还有过陶器文、砖瓦文，出土过金册、玉简等，它们也都不是特定的文字书写材料或者“书籍”，只是一些特殊用途的文字载体而已。我国古代最早的专用文字书写材料，一直是

竹木简牍，约在春秋时期正式书籍出现以后，除简册之外，还有写在丝织品上的帛书，以后它与简册一起为纸写本所代替。

参考文献

- 1 李学勤. 古文字学初阶.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2 李学勤. 英国出土的古代木简, 文物天地, 1987, (3)
- 3 王尧、陈践. 吐蕃简牍综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 4 胡厚宣. 甲骨文合集·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5 董作宾. 商代龟卜之推测. 见: 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编. 安阳发掘报告. 1929, (1)
- 6 董作宾. 殷墟文字甲编自序. 见: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殷墟文字甲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王玉良 1965年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文学史专业毕业, 现为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副研究馆员。发文10余篇。通讯地址: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39号。邮编100081。

(来稿时间: 1992-06-09。编发者: 刘喜中。)

1993年度全国图书资料系列 高级职称统一评审工作将在9月进行

最近从文化部有关部门获悉, 根据人事部图书资料系列高级职称实行全国统一评审的有关文件精神, 文化部在总结去年评审工作的基础上, 印发了关于报送全国图书资料系列高级职称统一评审材料有关事项的通知。

通知中首先指出, 1993年全国图书资料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定于9月召开评审会议,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务心必于8月1日以前将推荐评审高级职称材料报送文化部职改办。

通知对推荐呈报评审材料有关内容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较去年有了明显的改善, 如要求评审呈报材料包括: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个人业务自传”、“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参评人员所在单位“高级职称推荐评审表”、任现职以来已正式出版、发表的代表著作或代表论文, 要提交能够反映其本人的外语水平或考试的有关材料, 同时要出具省、部级人事职改部门委托评审函, 呈报破格评审的人员, 应提供本地区、本部门破格晋升条件的影印件。

通知还特别指出: 经全国图书资料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人员, 由文化部统一颁发任职资格证书, 全国有效。

(张铁中)

ways and means, bring to light to the maximum the literature resources collected both by their own department and their fraternal departments and transmit them to users in order that they may make full use of them. The methods used are models of ordering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services, compilation, dissolving, transforming,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reproduction.

Libraries — Reader services

Literature resources — Exploitation and development

G252

A General Talk about the Media of Chinese Ancient Writing and the Origin of Books / Wang Yuliang. 76—80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are not at all the earliest Chinese characters. The pictographs carved on the pottery of Dawenkou Culture remains are none other than the very sign of the appeara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being abou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world's oldest Babylonian cuneiform characters and the hieroglyphic characters of ancient Egypt appeared. It can be identified from the uses of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the bronze wares, sources of materials, the manufacture and the features of form and structure as well that both the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and the bronze wares were not materials for writing, thus they can not be called "books". The writing media for a special purpose in Shang Dynasty (c. early 17th—11th century B. C.) were bamboo slips or wooden tablets. 6 refs.

Ancient writing — China

Book science — History

G256.1

Features, Tasks and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s of County-level Municipal Libraries / Zhang Xin 81—84

On the grounds of statistics, China has seen an increase of towns from 92 in 1978 to 276 in 1979, among them those of county-level towns were 262 in number and they were tending to develop. Thus, to set up a number of county-level municipal libraries is a urgent matter at present. The county-level municipal libraries is different from the municipal library and also is not the same as the county library. The paper discusses features, tasks and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level municipal libraries.

County-level municipal libraries — Studies

Library undertakings — Studies.

G258.22

The Seventh National Symposium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he Middle-aged and Young Scholars Wuhan, China / Comp. by Lu Shang. 85—88

The Seventh National Symposium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he Middle-aged and Young Scholars was held in Wuhan, Nov. 17—20, 1992. 130 middle-aged and young scholars from 29 provinces, c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attended the meeting. The paper extracts and compiles 7 articles from the selected 150 and mor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 Symposia

Library undertakings — Reforms

G250.1

(钰坪译校)